日本的不婚化现象探析*

曹有顺　胡　澎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在这场社会转型中婚姻变化尤为明显，经济高速增长期构建起来的“全民皆婚”社会逐渐演变成不婚化社会。不婚化社会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结婚的吸引力和不婚的压力下降，结婚的难度提升，导致日本人的结婚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男女求偶的期望出现偏差以及稳定的婚姻匹配机制弱化，导致婚姻市场“失灵”，在不愿结婚与难以结婚的作用下，日本的不婚化程度日益加深，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在个人空间和独立日益成为年轻人生活追求的日本社会里，即使面对不婚化带来的诸多冲击，政府也难以过多介入个人婚姻，只能采取鼓励结婚和去家庭化的措施予以应对，然而这些措施又“药不对症”、进退维谷，难以有效遏制不婚化现象的加剧。

关 键 词：不婚化　少子化　个体化　社会冲击

作者简介：曹有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C913.1；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5）02－0121－24

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速报》显示，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为720988人，较上一年减少37643人，下降幅度达到5%，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①] 日本是东亚国家里较早着手应对少子化的国家，自1994年出台《天使计划》至今已有30余年，少子化政策渐趋完善，基本形成了从结婚到生育、从育儿到就业的全方位、一体化支持体系。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

* 本文系第七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入选论文，笔者根据评审意见做了大幅修改。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评审专家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本文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① 厚生労働省「人口動態統計速報（令和6年12月分）」、2025年2月27日、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geppo/s2024/dl/202412h.pdf[2025－03－0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少子化政策不断完善背景下，日本的少子化程度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发严峻，这不禁让人反思日本的少子化政策为何久治而效果不佳。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直言，日本的少子化政策是失败的，原因在于日本制定少子化政策时将欧美国家的模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日本并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范式，忽略了日本以结婚为生育前提的价值观念。① 具体而言，日本效仿欧美国家通过完善育儿服务、促进工作与育儿平衡等措施来制定其少子化政策，忽视了日本的少子化根源并不同于欧美国家，进而造成盲目效仿西方的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日本 2% 上下的婚外生育率②与欧美国家 50% 左右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③ 多数研究意识到日本少子化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婚化。④

日本人口学界将 50 岁的未婚率视作终身不婚率，把终身不婚率不断攀升的现象称作“不婚化现象”。⑤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男性和女性的终身不婚率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20 年男性已经达到 28. 25% 、女性达到 17. 81% ，⑥ 这意味着日本已有近三成的男性和近两成的女性走上终身不婚的人生道路。实际上，日本并非崇尚不婚主义的国家，甚至在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通过婚姻组建家庭，构建出一个“全民皆婚”社会。⑦ 70 年代中期以后，

① 山田昌弘：《少子化问题的亚洲特征——日本与欧美比较的视角》，《日本学刊》2019 年第 2 期，第 91 页。

② 婚外生育率也称作非婚生育率，是指没有缔结婚姻关系情况下生育子女的比例。

③ 内閣府『令和5 年度 年次経済財政報告』、2023 年 8 月、170 頁、https：//www5. cao. go. jp/j - j/wp/wp - je23/pdf/p02000. pdf[2024 - 06 - 08]。

④ 参见：赤川学『少子化問題の社会学』、弘文堂、2018 年、13 頁；岩澤美帆「少子化をもたらした未婚化および夫婦の変化」、高橋重郷・大渕寛編『人口減少と少子化対策—人口学ライブラリ16—』、原書房、2015 年、53 頁；桐原康栄「少子化の現状と対策」、『調査と情報—ISSUE BRIEF—』第 1163 号、2021 年 12 月、2 頁；白秋社編集チーム編著『未婚化する日本』、白秋社、2021 年、27 頁；胡澎：《日本人口少子化的深层社会根源》，《人民论坛》2018 年第 21 期，第 112—114 页。

⑤ 日本人口学研究会編撰『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 年、122 頁、249 頁。

⑥ 「表 6 - 23 性別、50 歳時の未婚割合、有配偶割合、死別割合および離別割合 1920—2020 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 年版）』、2024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 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 - 23. htm[2024 - 06 - 10]。

⑦ “全民皆婚”社会源于日语“皆婚社会”，是日本在战后形成的一种几乎所有人都结婚的社会状态。日本社会学家正冈宽司参考《国势调查报告》和速见融教授关于江户中期男性有配偶率的考察，认为日本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皆婚社会”。参见：正岡寛司「結婚のかたちと意味」、『家族社会学研究』1994 年第 6 号、46 頁。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认为，“战后到经济高速增长期，大部分年轻人既有相遇机会，婚后生活水准也能提高，只要想结婚，都能结婚，形成了 97% 左右的皆婚状态”。参见：山田昌弘「日本の結婚のゆくえ—困難なのか、不要なのか—」、山田昌弘・床谷文雄・平井晶子編『出会いと結婚』、日本経済評論社、2017 年、33 頁。日本社会学家没有明确“全民皆婚”社会的结束时间，但从终身不婚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不断攀升来看，可以认为“全民皆婚”社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结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随着日本社会转型，日本人的婚姻观也发生变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进入90年代后，晚婚进一步演变成不婚，不婚化现象在日本日渐浮出水面。为何象征着美好与圆满的婚姻在日本国民中失去了魅力？围绕这一问题，本文聚焦日本的不婚化现象，从时间维度上纵向梳理日本不婚化现象的演进历程，重点探讨日本不婚化现象的生成逻辑，并分析日本政府在应对不婚化现象上面临的困境。近年来，中国的婚姻模式进入转型期，[①] 这一研究或可为思考和分析中国的婚姻模式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一、从“全民皆婚”到不婚化的日本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详细记录了日本战后以来的婚姻数据，我们可以透过数据变化清晰地观察到日本社会从“全民皆婚”向不婚化转变的过程。图1是1950年至2020年日本终身不婚率和各年龄段未婚率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终身不婚率虽略有浮动却不曾超过5%，这意味着有95%以上的日本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结婚成家。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也常常被媒体界称作“全民皆婚”社会。进入90年代以后，一向稳定且偏低的终身不婚率突然攀升，似乎宣告了日本“全民皆婚”社会的崩溃与不婚化时代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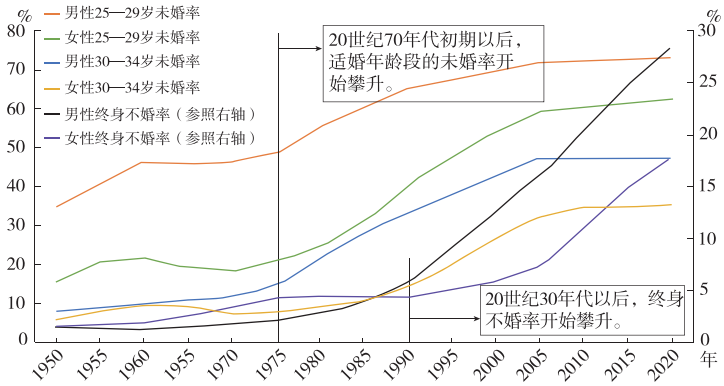
当然，日本从“全民皆婚”社会到不婚化时代也并非“一蹴而就”，其间还经历过不婚化的萌芽期。日本官方按照人口学的定义在统计终身不婚率时，取的是45—49岁和50—54岁两个年龄段的平均值。[②] 因此，理论上讲即便一个人选择一辈子不结婚，也只有当他到45岁以后才会对终身不婚率产生影响，这样一来，终身不婚率在统计上的滞后性势必会掩盖住不婚化的最新动向。观察图1中25—29岁和30—34岁两个适婚年龄段的未婚率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未婚率都出现了大幅度提升。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一现象被解释为晚婚化，即年轻人推迟了结婚的年龄，但当下重新审视这一变化发现，35岁之前没有结婚的年轻群体中到

① 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第20页。

② 「表12－37 都道府県、性別50歳時未婚割合（生涯未婚率）1920—2015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7改訂版）』、2017年4月10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17RE. asp? fname = T12－37. htm［2024－06－1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50 岁仍然没结婚的比例依然很高，因此有学者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实际上就是日本不婚化现象的开端。[①] 本文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初期的 20 余年称作日本不婚化的萌芽期，如此便可以将日本战后近 80 年的婚姻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全民皆婚”社会形成期、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初期的不婚化萌芽期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不婚化显现期。



注：终身不婚率为 50 岁的未婚率

图 1　日本终身未婚率和各年龄段未婚率的变化（1950—2020 年）

资料来源：终身不婚率的数据，参见：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 年版）』、2024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 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 - 23. htm[2024 - 06 - 10]；各年龄段未婚率的数据，参见：総務省統計局『国勢調査 2020 年』、2022 年 3 月 31 日、https：//www. e - stat. go. jp/stat - search/files? page = 1&layout = datalist&toukei = 00200521&tstat = 000001011777&cycle = 0&tclass1 = 000001011778&stat_ infid = 000001085974&tclass2val = 0[2024 - 06 - 10]。

（一）“全民皆婚”社会的形成期

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为日本“全民皆婚”社会的形成期，这一时期恰好处于日本由战败重建走向稳定、富足。稳定，既包括政治上由自民党与社会党相互对峙而形成的“1955 年体制”，又包括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为特征的日本式经营，还包括“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等等，这些宏观的、中观的或微观的社会结构共同维持着日本社会的稳定，让社会按部就班运行，让个体按部就班生活。富足，一方面是指日本在此期

① 山田昌弘『結婚不要社会』、朝日新聞出版社、2019 年、28 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间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国内生产总值（GDP）长期保持着年均9%以上[①]的高速增长，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得到了很好的分配，1968年日本顺利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国民产生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刺激了国民的消费，“三大神器[②]”到“新三大神器[③]”的消费升级将日本国民带入电器化时代。

社会环境的变迁影响着个体的婚姻选择，当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重新建设出一个稳定又富足的社会时，日本人也在婚姻领域中构建出一个人人都能结婚、人人都结婚的“全民皆婚”社会。这一时期日本迎来结婚热潮，婚姻数据呈现“一高二低”特点。所谓“一高”指的是结婚率高。日本的结婚率与结婚登记数在战后初期虽有过短暂下降，但是自1955年前后开始“触底反弹”并迅速增长，1972年上升趋势达到顶峰，当年有1099984对新人登记结婚，结婚率高达10.4‰。[④] 至于“二低”，一是指初婚年龄低。日本女性的婚姻曾经被揶揄成“圣诞节的蛋糕”，即过了24岁就变得“廉价”，所以日本女性纷纷在24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⑤] 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4岁，男性略高为27.2岁；1970年日本的平均初婚年龄不升反降，女性下降至24.2岁，男性下降到26.9岁，[⑥] 整个社会保持着较低的初婚年龄。二是指终身不婚率低。在高结婚率、低初婚年龄的“全民皆婚”时期，日本人似乎没有终身不婚的人生选项，197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

①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1956年至1973年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年度统计）为9.1%。参见：内閣府『令和2年度 年次経済財政報告』、2020年11月、293頁、https：//www5. cao. go. jp/j－j/wp/wp－je20/index_pdf. html[2024－06－12]。

② “三大神器”指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三件家用电器在日本家庭中普及。

③ “新三大神器”指彩电、空调、小轿车，此三件电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日本家庭中普及。

④ 「表6－1 初婚・再婚別婚姻数および婚姻率 1900—2021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3改訂版）』、2023年4月28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3RE. asp? fname = T06－01. htm[2025－02－17]。

⑤ 曹有顺、胡澎：《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23—24页。

⑥ 「表6－12 全婚姻および初婚の平均婚姻年齢 1899—2022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版）』、2024年5月10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12. htm[2025－02－1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仅有 1.7%，女性也只有 3.33%，[①] 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二）不婚化社会的萌芽期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的不婚化现象开始萌发。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依然保持着富足状态，虽然 1973 年全球性石油危机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但日本凭借着强大的经济韧性，在此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 GDP 年均增长率依旧能够达到 4.2%，[②] 人均 GDP 在 1987 年甚至一度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③] 然而，繁荣、富足的日本社会也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例如，1986 年日本实施《劳动者派遣法》以后，非正式员工日益增多，稳定的终身雇佣体系开始动摇；1985 年日本出台《男女雇佣均等法》以后，更多的女性选择走出家门、走上工作岗位，原本稳固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出现松动；等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曾经稳定的日本社会结构开始动摇、正在丧失稳定性。

具体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随着经济换挡而逐渐出现变化，原本“稳定且富足”的社会开始向“丧失稳定性但依旧繁荣”的社会转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全民皆婚”社会走向衰落，日本进入了“一降二升”的不婚化萌芽期。“一降”是指结婚率开始下降。日本的结婚率与结婚登记数在 1972 年达到峰值后出现断崖式下跌，1990 年只有 722138 对新人登记结婚，结婚率为 5.9‰，[④] 与 1972 年相比，结婚登记数减少了 377846 对，结婚率下降了 43.3%。“二升”所关注的同样是初婚年龄和终身不婚率。第一，初婚年龄开始上升。1990 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提升到 25.9 岁，男性更是提升至 28.4 岁，相较于 1970 年的 24.2 岁和 26.9 岁，[⑤] 日本社会中的晚婚化现象日渐凸显。第二，终身不婚率开始提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终身不婚，日本原本极低的终身不婚率水平开始被打破，1990 年男性的终

① 「表 6－23 性別 50 歳時の未婚割合、有配偶割合、死別割合および離別割合 1920—2020 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 版）』、2024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23. htm［2025－02－17］。

② 鞠重鎬「日本経済はなぜ低迷し続けるか—政策評価と日韓の考え方比較の視点—」、『政策オピニオン』第 263 号、2023 年 3 月 30 日、1 頁、https：//ippjapan. org/archives/7554［2024－06－12］。

③ 水野和夫「アメリカ経済 金融の構造的問題と新政権の課題」、『国際問題』第 579 号、2009 年 3 月、9 頁、https：//www2. jiia. or. jp/kokusaimondai_archive/2000/2009－03_002. pdf? Noprint［2025－02－17］。

④ 「表 6－1 初婚・再婚別婚姻数および婚姻率 1900—2021 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3 改訂版）』、2023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3RE. asp? fname = T06－01. htm［2025－02－17］。

⑤ 「表 6－12 全婚姻および初婚の平均婚姻年齢 1899—2022 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 版）』、2024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12. htm［2025－02－1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身不婚率突破5%达到5.57%，女性不婚率相对稳定，但也提升到4.33%。①

（三）不婚化社会的显现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社会的再次转型，不婚化现象日渐显现。在这次社会转型中，日本稳定的社会结构不再，流动取代了稳定；长期以来的经济繁荣也已经不再，差距取代了富足。所谓“流动”，一方面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出现漂流、雇佣变得流动、性别分工变得模糊，鲍曼笔下的“液态化社会”② 正在日本形成；另一方面则是指日本人的婚姻不再稳固如山，随着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婚姻、家庭也开始变得多样化、流动化。至于“差距”，日语环境中称为“格差”。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关注到日本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在其1998年出版的《日本的经济格差》一书中通过国际比较将日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展现出来。③ 近年来，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又在《新型格差社会》中进一步揭示了日本的家庭差距、教育差距、工作差距、地域差距、消费差距。④

在差距不断扩大、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转型中，日本进入了“一低二高”的不婚化显现期。“一低”指的是结婚率低。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结婚登记数与结婚率持续走低，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在2023年全年仅有474741对新人登记结婚，结婚率为3.9‰，⑤ 无论是结婚登记数还是结婚率都不足70年代初期的一半。“二高”，一是指初婚年龄高。在结婚率不断走低的同时，日本人的初婚年龄却仍在不断提高，2023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提高到31.1岁，女性也达到29.7岁，⑥ 晚婚化问题愈加深刻。二是指终身不婚率高。在结婚率持续走低、初婚年龄不断提高的双重“压力”作用下，日

① 「表6－23 性別50歳時の未婚割合、有配偶割合、死別割合および離別割合 1920—2020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版）』、2024年5月10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4.asp?fname=T06－23.htm[2025－02－18]。

② “液态化社会”是一种富有流动性、变化性的社会形态。鲍曼认为，现代化的“溶解力”已经将传统的社会规范、框架等“坚固的东西”溶解掉，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自由的社会秩序，并且液态化的力量已经从“体制”“政治”向“社会”“生活政治”渗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参见：ジ—クムンド・バウマン『リキッド・モダニティ液状化する社会』、森田典正訳、大月書店、2001年、3—20頁。

③ 橘木俊昭『日本の経済格差 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年、3—8頁。

④ 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会』、朝日新聞出版社、2021年。

⑤ 厚生労働省「令和5年（2023）人口動態統計（確定数）の概況」、2024年9月17日、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kakutei23/dl/02_kek.pdf[2025－02－11]。

⑥ 厚生労働省「令和5年（2023）人口動態統計月報年計（概数）の概況」、2024年6月5日、第15頁、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geppo/nengai23/dl/gaikyouR5.pdf[2025－02－1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本的终身不婚率开始陡崖式上升，2020 年男性的终身不婚率竟提高到 28.25%，女性不婚率也高达 17.81%。[①] 30 年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终身未婚率均有数倍增长，而且数值之高，放眼全球也处于较高水平。

综上，在战后近 80 年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从稳定、富足型社会走向了流动、差距型社会。伴随着社会转型，在婚姻领域，日本也从高结婚率、低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的“全民皆婚”社会走向了低结婚率、高初婚年龄、高终身不婚率的不婚化社会。

二、日本不婚化现象的生成逻辑

对于为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走上了不婚的人生道路这一问题，似乎可以罗列出众多缘由，例如经济压力、个人主义等等，却无法给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回答。面对这种困境，我们不妨转换思考方式，寻找何种因素能促使人们走进婚姻，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因素或消失或衰弱，便可能是人们选择不结婚的理由。

（一）日本结婚行为的分析框架

从历史的观点看来，经济因素是结婚的主要理由，[②] 恩格斯就认为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对继承权的关切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便更加考虑经济因素。[③] 经济学家贝克尔则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揭示了婚姻与经济的具体关系，强调人们如果从婚姻中获得的效用超过单身就会选择结婚。[④] 虽然婚姻效用说很好地回答了经济因素是如何作用到个体身上使他们做出婚姻选择，但是人们在婚前无法精准计算出婚姻的收益，更难以抑制住内心情感而做出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人们选择结婚，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缘由。因此，在探究日本为何会从“全民皆婚”社会走向不婚化之前，我们需要在婚姻的演变中找到影响当代日本人结婚的关键因素，并基于合适的理论构建起分析日本结婚行为的框架。

---

① 「表 6－23 性別 50 歳時の未婚割合、有配偶割合、死別割合および離別割合 1920—2020 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 版）』、2024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23. htm[2025－02－18]。

② 顾雨：《人类独身史》，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 47 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85 页。

④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9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文化人类学家们努力考察世界各地的婚姻，发现结婚这种跨文化性的现象可以归结到“排他的性关系”和“嫡出原理”两个概念上，[①] 婚姻不仅能通过这两项功能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而且能通过两人的结合将不同的中间集团联系起来。在个体被牢牢嵌套在家庭之中的日本传统社会里，结婚是家庭繁荣的手段，当事人没有太多的发言权，[②] 直到经历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婚姻才得以从家庭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1947 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婚姻仅以两性自愿结合为基础而成立”[③]，日本由此完成了家庭主义婚姻向个体主义婚姻的转变。然而，个体主义婚姻一方面意味着个体获得婚姻自由，是否结婚、和谁结婚不再由他人意志决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结婚意愿；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个体将面临被拒绝的风险，只要当事人一方不同意婚事，任何人没有权利强迫两人结婚。个体主义婚姻的两个面向决定了人们是否结婚主要取决于自己的结婚意愿，而能否结婚则主要取决于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结果。

如上，影响当代日本人结婚的关键因素可以归结为结婚意愿（内部因素）和婚姻市场（外部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向下挖掘，寻找何种具体因素影响着结婚意愿和婚姻市场。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专门探讨个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主张行为意向决定行为，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主要变量影响着行为意向。其中，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种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④] 然而，个体主义婚姻的双重面向导致个人的结婚意向并不

① 山田昌弘『結婚不要社会』、49 頁。

② 例如，明治民法规定“缔结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需要取得户主同意”，而且“男性未满 30 岁，女性未满 25 岁的，结婚需要取得父母同意”。参见：法律情報基盤『明治民法』、750 条、「家族カ婚姻又ハ養子縁組ヲ為スニハ戸主ノ同意ヲ得ルコトヲ要ス」、https：//law - platform. jp/hist/129089d/129089_131009/AQLuAQEB#rev - 5af95f0aea0bef26fd8cc031［2024 - 08 - 10］；法律情報基盤『明治民法』、772 条、「子カ婚姻ヲ為スニハ其家ニ在ル父母ノ同意ヲ得ルコトヲ要ス但男カ満三十年女カ満二十五年ニ達シタル後ハ此限ニ在ラス」、https：//law - platform. jp/hist/129089d/129089_131009/AQMEAQEB#rev - 5af95f0aea0bef26fd8cc031［2024 - 08 - 10］。

③ 参见：e - GOV 法令検索『日本国憲法』、第二十四条、「婚姻は、両性の合意のみに基いて成立し、夫婦が同等の権利を有することを基本として、相互の協力により、維持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https：//laws. e - gov. go. jp/law/321CONSTITUTION#Mp - Ch_3 - At_24［2024 - 08 - 15］。

④ 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评述》，《心理科学进展》2008 年第 16 期，第 315—31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能完全决定结婚行为，能否结婚还要看其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结果。这里的婚姻市场并非经济学里的婚恋市场，而是将婚姻看作一个市场，处于适婚期且有结婚意愿的男女形成婚姻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为有结婚意愿的男女“牵线搭桥”的媒介则形成了婚姻市场的匹配机制。既有研究将日本结婚率的下降归结为“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相遇途径”三个方面，[①] 这样我们可以借助经济学中的供需平衡、匹配机制等概念和理论来探究影响婚姻市场的因素。基于以上的讨论，接下来将从结婚意愿与婚姻市场两个层面出发，尝试构建解释日本结婚行为的分析框架，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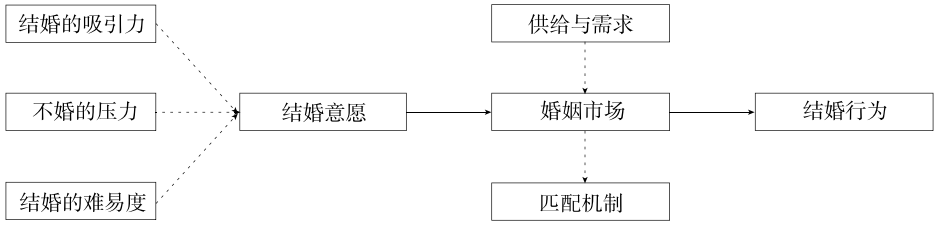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结婚行为的分析框架

在婚姻自由的社会环境里，结婚行为主要受个人的结婚意愿和婚姻市场影响，个人的结婚意愿越高，进入婚姻市场的动力就越大，而婚姻市场越是有效运行，个人结婚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此，在结婚行为的分析框架中还蕴含着两个子问题。

第一，何种因素影响个人的结婚意愿？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人们从事某事的意向越大，反之则越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婚意愿主要受到“结婚的吸引力”“不婚的压力”“结婚的难易度”三个主要变量影响，且结婚吸引力越大、不婚的压力越大、结婚的难易度越低，结婚意愿越强，反之则越弱。其中，“结婚的吸引力”是指个体感到结婚带来好处的程度，好处越多，吸引力越大，结婚意愿越强；“不婚的压力”是指个体不结婚将会面临的各种压力，如舆论压力、经济压力、劳务压力等，这些压力越大，个体的结婚意愿越强；“结婚的难易度”是指个体感到结婚的难易程度，难度越大，个体就越容易丧失结婚信心，结婚意愿就越弱。

① 岩澤美帆・三田房美「職縁結婚の盛衰と未婚化の進展」、『日本労働研究雑誌』第 535 号、2005 年 1 月、16—28 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第二，何种因素影响婚姻市场？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中，经济条件、学历水平、工作、相貌等个人自带属性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能否结婚的关键因素。但笔者并不打算从个人属性视角出发解读日本不婚化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时代里个人属性都是千差万别且不断变动的，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属性的定量研究多侧重一个时间点的分析，难以看出长时间段的演变。在婚姻市场中，只有个人的某种属性满足了结婚对象的某种期待，才能成为婚姻市场的有效供给，因此笔者将个人属性对结婚行为的影响放进婚姻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中去考虑。在经济学中，供需平衡、高效匹配都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故此笔者认为在婚姻市场中供给与需求取得平衡、匹配机制发挥效用，婚姻市场才会有效运行，而供需失衡、匹配机制失效时，婚姻市场将会“失灵”。

（二）结婚意愿下降

本文所谓的结婚意愿指个体对结婚行为的态度或心理倾向，主要受“结婚的吸引力”“不婚的压力”以及“结婚难易度”三个变量影响。据上文分析可知，结婚的吸引力越大、不婚的压力越大、结婚的难易度越低，结婚意愿越强，反之则越弱。这三个变量在战后的变化对日本社会的结婚意愿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一，家庭对内功能减弱，结婚的吸引力下降。结婚的吸引力是指个体感到结婚行为能够带来好处的程度，主要体现在家庭对内功能的强弱上，家庭对内功能越强，给个体带来的好处越大，反之则越小。所谓“家庭对内功能”，是指家庭相对于家庭成员发挥的功能，家庭社会学家大桥薰将其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固有功能（性・爱情、生育・养育）、基础功能（生产・劳动、消费・赡养）和派生功能（教育、保护、休息、娱乐、信仰）。[①] 家庭对内的三大功能随着战后日本产业化、公共化迅猛发展而日渐弱化。首先，以保护、娱乐为代表的派生功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商业化进程中被保险机构、娱乐设施等取代，这些功能的外部化让当代的日本人即使没有家庭的保护，只要有足额的保险也可以安稳过一生，即使没有家人的参与，只要有娱乐设施也能够愉悦自己。其次，基础功能中的生产与劳动早在日本踏入现代化进程时即被公司的雇佣所取代，剩下的经济赡养、护理功能也随着《国民年金法》《护理保险法》等一部部社会福利法的出台走向了社会化。最后，性、生

① 大橋薫・増田光吉編著『改訂家族社会学』、川島書店、1976 年、25 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育这些被认为是少有改变的固有功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开始发生变化；此后，随着婚前性行为在日本的普及以及助孕技术的发展，原本一体化的“婚姻—性—生育”开始走向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家庭丧失了这些功能，而是指即使没有家庭，家庭所具备的部分功能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家庭对内功能弱化降低了人们通过婚姻组建家庭的必要性，加上家庭对外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大大束缚了自由，结婚的吸引力自然被大打折扣。

第二，社会多元化增强，不婚的压力减弱。“不婚的压力”指的是未婚个体感到不结婚将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形成压力并作用到个体身上使其走进婚姻。它既可以是物质上的，如经济压力、家务压力；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如舆论压力、社会环境压力等。现实中无论物质上的压力还是精神上的压力，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社会的转型中逐渐降低。物质上的“减压”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家务两个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标准化家庭模式，形成了“家庭的战后体制”①，大家都在 20 多岁结婚，婚后男性在外挣钱养家、女性在家料理家务。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里，男女之间构成互补关系，女性在经济上依附男性，而男性在家务上依靠女性。然而，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女性高学历化和产业转型，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参与劳动力市场，实现了经济自立，渐渐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同一时期，各种电器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各种便利店出现在大街小巷，加上家政服务业的普及，家务外部化让男性对女性的家务依赖程度亦日益降低。精神上的“减压”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人的婚姻状况作为隐私的一部分被保护起来，旁人难以轻易言及，甚至过多言论还会被认定为性骚扰，② 单身人士承受的催婚压力减弱。另一方面，随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传宗接代的婚育规范日渐式微，单身群体不断壮大并在大城市形成了独特的单身文化。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有七成的人赞成“结婚是个人自由，结不结都可以”。③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对于个体而言，

① 落合惠美子：《21 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 4 版）》，郑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11 页。

② 上機美穂「結婚とプライバシーⅠ—婚姻の公表とプライバシーⅠ—」、『札幌法学』2012 年第 2 号、125 頁。

③ 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 21 年 10 月）』、2009 年 12 年 7 日、https：//survey. gov－online. go. jp/h21/h21－danjo/2－2. html［2024－06－2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不结婚不仅不会遭到诘问，而且还能很快地找到接纳自己的群体。总之，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无论物质上男女之间的依赖关系，还是精神上外界对未婚者的苛责，都大大减弱，外加于未婚者身上的不婚压力也都降低了。

第三，日本经济转型，结婚难度增大。在任何年代里，和理想伴侣结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难事，因此本文的“结婚难易度”不是指个体实现与理想伴侣结婚的难易度，而是指个体感到实现结婚行为本身的难易程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人们到了适婚年龄基本都会结婚成家，终身不婚率只有3%左右，是一个“阿猫阿狗都能结婚的时代”。[①] 为何这一时期日本的结婚难度会如此之低？山田昌弘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绝大部分人和谁结婚都能过上富裕的家庭生活，人们对向上流动的期待以及能够实现阶层的跨越是‘全民结婚社会’的基础”。[②]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稳定的终身雇佣体系开始变得流动化，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员工看不清未来的生活，“全民皆婚”社会的基础崩溃了。年轻人在寻求婚姻中屡屡碰壁，不得不将婚姻一推再推，但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结婚难的困境。2007年山田昌弘和白河桃子仿照“就业活动”创造出“结婚活动”（婚活）一词，旨在表达人们为了获得好婚姻，精心打扮自己、积极参加男女联谊会、相亲会等活动，[③] 因其生动而精准地表达出日本人的婚姻现状，很快成为流行语被大家所熟知。“婚活”一词的出现不仅降低了人们对参加相亲活动的抵触感，而且也告诉年轻人“现在已经不是谁都能自然而然地结婚的时代了”。[④] 近年来的社会调查数据也显示日本年轻人感到结婚困难，2022年日本公益财团法人“1more Baby”应援团对20多岁的年轻人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成的人认为“日本是一个结婚困难的社会”。[⑤]

（三）婚姻市场“失灵”

我们还需要将目光投向另一个影响结婚行为的因素——婚姻市场。如上所述，当婚姻市场中供给与需求取得平衡、匹配机制能够发挥效用，婚姻市场就会顺畅运行，反之则会失灵。故此，接下来将从供需与匹配两个视角考

① 上野千鹤子：《一个人的老后》，杨明绮译，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② 山田昌弘『結婚不要社会』、124—129頁。

③ 山田昌弘・白河桃子：《“婚活”时代》，郑杨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2010年，第1—2页。

④ 佐藤広樹・永井暁子・三輪哲『結婚の壁—非婚・晚婚の構造—』、勁草書房、2010年、4頁。

⑤ 公益财团法人1moreBoby应援团『20代の結婚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22年11月2日、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0009.000045328.html[2024－06－25]。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察日本婚姻市场的变化。

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看，日本两性对结婚对象的期待发生错位，婚姻市场的供需出现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终身雇佣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式雇佣体系已经形成，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便是自营业的个体户、从事农业的农户，其收入也会年年增长，① 男性的经济能力能够满足女性向上流动的期待。在性别分工明确的时代里，养儿育女、照看家庭被视为女性的职责所在，女性的主妇化也满足了大部分男性的内助需求。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婚姻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这很快被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转型打破。

一方面，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本女性对男性的经济要求越来越高，而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男性的收入越来越难以回应女性的经济期待。虽然有研究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由“三高”转向了“三低”②，其依据是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进行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③ 但是，仔细翻阅 1992 年以来的六次调查可以发现，日本女性重视和考虑结婚对象的经济能力的比例并未下降反而略有上升，并且一直维持在 90% 左右的高位。④ 可见，“三低”只不过是女性在保证经济前提下的附加要求而已。在日本，婚姻对于男性而言只是一个事件，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次重生，⑤ 既然是重生，在一切不确定的情况下，女性自然对经济条件十分执着。女性对结婚对象的经济期待大多基于父辈的经济水平，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父辈的经济水平低，女性的经济期待自然也不高，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父辈的经济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女性对结婚对象的经济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然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大量企业缩减招聘以至年轻人遭遇“就职冰河期”，在就业难的背景下，代际差距不断拉大，能够满足女性经济要求的男性开始大量减少。据明治安田研究所的调查，20 岁至 40 岁的未婚女

① 参见：厚生労働省『厚生白書平成 8 年版』、1996 年 5 月 27 日、https：//www. mhlw. go. jp/toukei_ hakusho/hakusho/kousei/1996/dl/04. pdf[2025 - 02 - 19]。

② “三高”指的是高收入、高学历、高身高，“三低”指的是低姿态、低依赖、低风险。

③ 刘冰：《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第 70—71 页。

④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 16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 年 8 月 31 日、https：//www. ipss. go. jp/ps - doukou/j/doukou16/JNFS16_ ReportALL. pdf[2024 - 06 - 25]。

⑤ 山田昌弘『結婚不要社会』、19 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性中，有半数以上对结婚对象的年收入要求在400万日元以上，而实际上年收入能达到400万日元的男性并不多，20多岁男性中仅有15.2%，30多岁的男性也只有37%。①

另一方面，随着性别分工模式的崩溃，男性越来越看重女性的经济能力，而越来越多的女性却想要回归家庭，女性的理想生活也难以契合男性的择偶要求。在性别分工明确的时代里，男性并不重视女性的经济能力，但是当家庭分工模式由性别分工向双职工转变后，男性的择偶标准也将倾向于看重女性的经济能力。② 在所谓“失去的30年”里，日本人对结婚对象的要求中变化最大的要数男性对女性的经济期待，其次是职业期待。1992年，只有26.7%的男性会考虑或重视女性的经济能力，只有39.4%的男性会关注结婚对象的职业，而这两项数据在2021年分别攀升至48.2%和46.5%，③ 接近一半。在男性愈加看重女性经济能力的背景下，近年来日本的职业女性却显示出希望回归家庭的动向。据索尼生命的调查，职业女性当中有36.7%的人“想成为家庭主妇”，其中20多岁女性的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3.2%。④ 当男性的经济能力难以回应女性的结婚期待、女性的理想生活也难以与男性的择偶要求相契合时，婚姻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失衡。结果是，即便当今日本社会依然有八成以上的人表示自己“总有一天要结婚”，但是总有相当数量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⑤。

从匹配的视角来看，随着日本“职缘结婚”⑥ 走向低迷，有效的婚姻匹

① 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20—40代の戀愛と結婚—第9回結婚・出産に関する調査より—」、2016年6月20日、https://www.myri.co.jp/research/report/pdf/myilw_report_2016_01.pdf[2024-06-25]。

② 永瀬圭「男性の配偶者選択の基準に関する分析—社会経済的地位に注目して—」、『京都社会学年報』2016年第24号、96頁。

③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16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年8月31日、https://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6/JNFS16_ReportALL.pdf[2024-07-05]。

④ ソニー生命『女性の活躍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19』、2019年4月24日、https://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019/nr_190424.html#sec6[2024-07-06]。

⑤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第16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2021年日本男性有81.4%、女性有84.3%的人表示“总有一天会结婚”，但是在18—24岁男性中有29.8%、女性有36%，在25—34岁男性中有43.3%、女性有48.1%表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参见：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16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年8月31日、https://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6/JNFS16_ReportALL.pdf[2024-07-05]。

⑥ “职缘结婚”是指两性在职场或者工作中结识并结为夫妇的结婚类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配机制出现弱化。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社会与文化都完成了一次蜕变，在新旧更迭的过程中，恋爱结婚超过了相亲结婚，成为主流的结婚形式。然而，即便恋爱结婚取代相亲结婚，配偶选择的结果并未发生变化，因为它依然遵循着同类婚原则，① 只不过“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由家庭转向职场。在“恩情主义”盛行的日本职场里，经理与雇员之间有密切的个人交往，厂长或主任作为媒人参加雇员的婚礼是常有的事。② 日本的职场似乎存在着促进男女交往的独特要素，职场、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网支撑着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结婚热潮。③ 据统计，在已婚夫妇中，通过职场和工作结识并走进婚姻的比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迅速提升，即使到 90 年代初期其占比也能达到 35%，④ 在所有夫妇相识契机中稳居首位。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职场日益呈现流动化以及个人隐私意识逐渐增强，通过职场和工作相识并结为夫妇的比例明显减少，职缘结婚开始走向低迷。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进行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通过职场和工作相识结婚的比例从 1992 年开始逐年下跌，2005 年长年稳居首位的职缘结婚被“通过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介绍认识结婚”的比例超越，到 2021 年只有 21.4% 的已婚夫妇是在职场或工作中结识。⑤ 职缘结婚的低迷意味着日本职场原本作为婚姻匹配机制的功能出现了弱化，如果没有其他匹配机制来弥补职场弱化的部分功能，日本的婚姻匹配机制势必难以发挥效用。2007 年山田昌弘和白河桃子提出“婚活”以后，“婚活”一词逐渐超越了它本身的意思，成为一种相亲中介的商业活动。⑥ 虽然“婚活”看似能给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异性的未婚者提供交往平台，通过高效的匹配机制在更广泛的地域空间中找到合适的对象，但是三轮哲的定量研究发现，虽然说进行“婚活”的人比不进行“婚活”的更容易找到对

① 上野千鶴子「『戀愛』の誕生」、吉川弘之（代表著者）『結婚』、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 年、77 頁。

② 中根千枝：《日本社会》，许真、宋峻岭译，天津：天津人们出版社，1982 年，第 68 页。

③ 岩澤美帆「職縁結婚の盛衰からみる良縁追及の隘路」、佐藤広樹・永井暁子・三輪哲編著『結婚の壁—非婚・晩婚の構造—』、45 頁。

④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 15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17 年 3 月 31 日、https：//www. ipss. go. jp/ps - doukou/j/doukou15/NFS15_ reportALL. pdf[2024 - 07 - 10]。

⑤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 16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 年 8 月 31 日、https：//www. ipss. go. jp/ps - doukou/j/doukou16/JNFS16_ ReportALL. pdf[2024 - 07 - 10]。

⑥ 山田昌弘编著：《“婚活”现象的社会学：日本的择偶现状》，周洁、滑美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第 1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象，但如果除去个人收入、工作、交流能力等个人自带属性的影响，实际上也未能明显看出“婚活”的实际效果。[①] 中村真里子整理了1966年、1973年以及1977年至2010年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数据，发现通过婚介公司介绍相识的夫妇比例在任何年份都是比较少的，即使在“婚活”作为商业活动大肆宣传的2010年，该比例也仅有2%上下。[②] 故此可以认为，当日本职场不再是两性邂逅的主要场所、新型的“婚活”又难以发挥作用时，婚姻市场的匹配机制势必会弱化。这也导致日本社会里虽然仍有大量的未婚者积极地参与婚姻市场，但是苦于没有有效的匹配机制，以至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将结婚的吸引力、不婚的压力、结婚难易度以及婚姻市场的供需、匹配机制等影响结婚行为的因素进行量化并给出具体数据来呈现出其变化存在难度，但通过上述分析能切实地感受到，一方面，日本从“高结婚吸引力、高不婚压力、低结婚难度”社会走向了“低结婚吸引力、低不婚压力、高结婚难度”社会；另一方面，日本的婚姻市场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供给与需求失衡、婚姻的匹配机制也不再奏效的现象。在结婚意愿与婚姻市场的双重变化推动下，日本由“全民皆婚”社会走向了不婚化社会。

三、日本应对不婚化的困境

不婚化社会的到来给个体单一的生命历程带来多样化的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不再由他人决定而成为个人的自由。但是，婚姻在当今日本社会里依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个体婚姻的变动不仅关系到家庭制度的存续，也影响到人口的再生产。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不婚化现象不断显现并逐渐深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也不断增强，不仅加深了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程度、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且加重了社会的养老负担等。面对不婚化现象带来的诸多冲击，日本政府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为了探明这些对策为何收效甚微，需要深入剖析日本政府在应对不婚化问题上面临何种困境。

① 三輪哲「現代日本の未婚者の群像」、佐藤広樹・永井暁子・三輪哲編著『結婚の壁—非婚・晩婚の構造—』、31頁。

② 中村眞理子「出会いと結婚の半世紀—人口学からみた変化と連続性—」、平井晶子・床谷文雄・山田昌弘編『出会いと結婚』、日本経済評論社、2017年、51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公共部门难以介入个人婚姻

如上所述，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家庭观念逐渐改变，家庭主义婚姻向个体主义婚姻转变，婚姻由此退回到私人领域成为个人的自由。《日本国宪法》的颁布没有立刻改变人们的婚恋行为，战后初期仍然有 59.8% 的人通过相亲结婚，只有 21.4% 的人是通过自由恋爱走进婚姻的。但是，日本的婚恋形式很快迎来转变，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恋爱结婚的比例达到 48.6%，超过相亲结婚的 44.9%，成为日本主流的结婚形式，90 年代以后甚至有八成以上的日本人选择恋爱结婚，相亲结婚的人则不足一成。① 随着婚恋形式的转变，日本人的结婚自由意识也进一步增强。据日本内阁府进行的舆论调查，“结婚属于个人自由”的支持率从 1992 年的 62.7% 上升至 2009 年的 70%，其中 20 岁至 49 岁的人群中有八成以上的人认可这一观点。② 可见，在当今日本社会里，结婚属于个人自由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在婚姻自由意识向一般大众普及的过程中，日本现代婚姻的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结婚属于个人私事，结婚或者不结婚均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婚外生育率仅略高于 2% 的日本社会显然对非婚生育不够包容，国家、社会发展和延续所需要的人口再生产又离不开个体的婚姻。婚姻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让日本陷入“结婚、生育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大家都不结婚、不生育，社会将会消失”③ 的困境。面对困境，日本政府显得束手无策，宪法和民法都规定婚姻属于个人自由，加上婚姻自由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使得政府难以过多介入个人婚姻。如果政府将结婚这种极具隐私性的行为作为政策目标的话，难免会招致“干涉个人自由”的批判。④ 原内阁府参事官、少子化社会对策负责人增田雅畅就曾坦言，“在内阁府任职时，当政府计划出台支持营造男女相遇场所的政策之际，就会受到干涉个人婚姻自由的指责，根本无法将促进结婚的措施加以政策化”。⑤ 事实上，日本不仅难以出台“催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 16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 年 8 月 31 日、48 頁、https：//www. ipss. go. jp/ps - doukou/j/doukou16/JNFS16_ reportALL. pdf[2024 - 11 - 16]。

② 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 21 年 10 月調査）』、2009 年 12 月 7 日、https：//survey. gov - online. go. jp/h21/h21 - danjo/2 - 2. html[2024 - 11 - 16]。

③ 山田昌弘『結婚不要社会』、63 頁。

④ 筒井隆志「男性に結婚を促すために—少子化対策の残された政策課題—」、『立法と調査』2007 年第 6 号、74 頁。

⑤ 増田雅暢「日本型家族政策の考察—少子化対策はなぜ成果をあげないか—」、『政策オピニオン』第 67 号、2017 年 10 月、2 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婚”政策，就连催婚言论也很容易遭到抵制。2014 年 6 月 18 日，女议员盐村文夏在东京都议会上询问女性妊娠、生育支持政策时即遭到“（你）自己赶快结婚吧！”的嘲讽，还引发了市民大规模抗议。①

故此，在崇尚婚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日本政府即便面对不婚化带来的多重冲击，也无法过多介入个人婚姻，更无法像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一般制定出全面的、一体化的“催婚”政策，只能在少子化政策和“地方创生”政策②中加入支持年轻人结婚的措施，以鼓励结婚的方式来促进家庭的再生，从而维持和巩固社会的现有状态。同时，日本政府还不得不出台并不断完善《护理保险法》、成年监护制度等，以去家庭化③的方式来降低家庭的作用，从而减缓家庭缺失带来的冲击。

（二）鼓励结婚的措施难见成效

日本民众反对公共部门干涉个人婚姻自由的声音很大，政府不得不将鼓励结婚的措施分散到少子化政策和“地方创生”政策之中。例如，2013 年日本少子化政策会议制定的《突破少子化危机的紧急对策》中明确将“结婚、妊娠、生育支持”作为少子化政策“三支箭”中的一支。④ 2015 年出台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中将“人人都能实现结婚、生育的社会”作为基本目标，把“结婚、妊娠、生育、育儿各阶段不间断支持”和“社区、企业等社会支持”作为少子化对策的两大支柱，细化应对措施。⑤ 除少子化政策之外，“地方创生”政策中也能看到对年轻人结婚的支持。例如，2014 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城镇・人・就业创生综合战略》就把“让年轻人实现结婚、生育、育儿愿望”作为基本目标之一，试图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工作稳定、能够实现结婚生子的经济环境。⑥ 近年来，日本甚至设立了专用资金来支持年轻人

① 「女性議員に『早く結婚しろ』都議会でヤジ飛ぶ」、『日本経済新聞』2014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 nikkei. com/article/DGXNASDG1903P_Z10C14A6CC1000/[2024 - 11 - 06]。

② “地方创生”是日本政府为纠正东京一极独大、遏制地方人口减少、提升整体活力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③ 去家庭化是丹麦学者哥斯塔・埃斯平 - 安德森（Gsta Esping - Andersen）提出来的概念，指的是降低个人对家庭依赖的政策。参见：西野理子・米村千代編著『よくわかる家族社会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9 年、121 頁。

④ 内閣府『少子化危機突破のための緊急対策』、2013 年 6 月 7 日、3 頁、https：//www. kouikirengo - osaka. jp/news/pdf/16sankou1. pdf[2024 - 10 - 09]。

⑤ 内閣府『少子化社会対策大綱』、2015 年 3 月 20 日、3 頁、https：//warp. da. ndl. go. jp/info：ndljp/pid/12772297/www8. cao. go. jp/shoushi/shoushika/law/pdf/shoushika_taikou2. pdf[2024 - 10 - 09]。

⑥ 内閣府地方創生事務推進局「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2014 年 12 月 27 日、https：//www. chisou. go. jp/sousei/info/pdf/20141227siryou4. pdf[2024 - 10 - 1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走进婚姻，2023 年儿童家庭厅拿出 100 亿日元的预算专门用于支持各地开展的“结婚支持重点项目”、“新婚生活支持项目”等。①

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结婚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单身人士面临结婚难的关键性问题，因而难以阻止结婚率持续走低的趋势，2023 年甚至以 3.9‰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值。2016 年日本内阁府委托日本调查中心对地方自治体进行的少子化对策展开调查，发现各市町村主要从成立结婚支持中心、开办“婚活”讲座、举办相亲活动等几个方面入手来支持年轻人结婚，其中举办相亲活动是最为普遍的做法，有 44% 的市町村采取了这一措施。② 但是，举办相亲活动在促进结婚方面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调查显示，在 1091 个市町村中有 51.4% 的市町村在 2016 年度举办过相亲活动，平均每个市町村举办 6 场活动、每场活动有 102 人参加，但最终成婚的平均每场仅有 0.9 对，③ 如果再扣除性格等个人属性的影响，相亲活动促成结婚的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有结婚意愿但依旧单身的年轻群体中，选择单身的最大理由一直都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④，举办相亲活动固然能够给适婚的单身男女提供相识的机会，但是在如今的日本社会里，市场上的婚介公司、网络上的交友软件多如牛毛，形形色色的社团聚会更是数不胜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的主要原因并非缺乏结识异性的途径，而是身边缺少符合自己期待的结婚对象。如上文分析，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寻找结婚对象时都更倾向于看重对方的经济能力，日本政府虽然在鼓励结婚的对策中多次强调要稳定年轻人的就业、提高年轻人的收入，但是实际上流动化的就业环境并未得到改善。由总务省统计局实施的《劳动力调查（2023 年）》数据可知，近十年来日本非正式员工的数量和比例总体保持上升趋势，

① 子ども家庭庁「令和5年度 地域少子化対策重点推進交付金」、2023 年 4 月 1 日、https：//www. cfa. go. jp/policies/shoushika/koufukin/r5[2024 - 08 - 26]。

② 内閣府『地域少子化対策強化事業の調査研究・効果検証と取組事例調査』、2017 年 2 月、14—15 頁、https：//warp. da. ndl. go. jp/info：ndljp/pid/13024511/www8. cao. go. jp/shoushi/shoushika/research/h28/kouka_kensho/pdf/print. pdf[2024 - 11 - 07]。

③ 公益財団法人東京市町村自治調査会『結婚支援を糸口とした少子化対策及び地域活性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2019 年 3 月、16 頁、https：//www. tama - 100. or. jp/cmsfiles/contents/0000000/830/H30kekkon_all. pdf[2024 - 11 - 03]。

④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 16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 年 8 月 31 日、https：//www. ipss. go. jp/ps - doukou/j/doukou16/JNFS16_ReportALL. pdf[2024 - 07 - 05]。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23 年非正式员工已经达到 2124 万人，占到所有雇佣者的 37.1%。[①] 非正式员工数量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程度反映了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和经济状况未能得到改善，单身男女遇到“合适对象”的概率下降，一味地举办相亲活动也难以促使他们走进婚姻。

总而言之，在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没有能力真正解决国民面临结婚难的经济课题，地方自治体只能采取举办相亲活动、加大宣传力度等措施，然而这些“药不对症”的措施犹如隔靴搔痒，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效果。

（三）去家庭化的措施进退两难

日本政府在鼓励人们结婚的同时，还采取了去家庭化的方式来缓解不婚化带给个体和社会的冲击。2000 年日本正式实施的护理保险制度，由国家税收和个人保险按照各 50% 的比例拿出资金作为财源，在被保险人需要护理时，由相关服务机构向其提供在家、社区、设施等的护理服务，个人最多承担服务费用的三成[②]，剩余部分由政府承担。[③] 护理保险制度打破了只有依靠家庭才能安度晚年的养老模式，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将照料老人的体力劳动社会化了。然而，护理的社会化是以家庭承担部分责任为前提设计的，即便护理的体力劳动外部化了，利用护理保险制度时产生的护理管理、协调以及责任还停留在家庭内部。[④] 即，虽然护理的具体劳动可以由外部提供，但是什么时候提供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仍需自己或家人来决定，护理保险制度之下的护理仍然对家庭有所依赖。与护理保险制度同年实施的还有成年监护制度，由民法上的法定监护制度和意定监护契约法上的意定监护制度构成，主要为缺乏判断能力的个人提供财产管理、人身监护（契约行为）支持。[⑤] 其中，法定监护制度是一种事后指定型制度，在当事人缺乏判断能力以后，由市町村长等向家庭仲裁部门提交申请，在本人或者四亲内的亲属中选定监护人。

① 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詳細集計）2023 年結果の概要」、2024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 stat. go. jp/data/roudou/sokuhou/nen/dt/pdf/gaiyou. pdf[2024 - 11 - 08]。

② 《护理保险法》经过修改以后规定，从 2019 年 8 月开始，年金收入等超过 340 万日元的个人需要承担护理服务费用的三成，但是每月支付金额上限为 44400 日元。参见：厚生労働省「給付と負擔について」、2023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 mhlw. go. jp/content/12300000/001119101. pdf[2024 - 11 - 08]。

③ 厚生労働省「公的介護保険制度の現状と今後の役割」、2018 年 12 月 10 日、13 頁、https：//www. mhlw. go. jp/file/06 - Seisakujouhou - 12300000 - Roukenkyoku/0000213177. pdf[2024 - 10 - 29]。

④ 藤崎宏子「介護の社会化—その問題構成—」、『法律時報』第 78 巻第 11 号、2006 年 10 月、37—43 頁。

⑤ 税所眞也『成年後見の社会学』、勁草書房、2020 年、19 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与之相反，意定监护制度是一种事前准备型制度，在当事人判断能力下降以前，通过公证契约的方式由本人与其希望未来监护自己的个人或机构签订监护契约，当事人认知能力下降后即由预先指定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① 意定监护制度的监护人范围比法定监护制度更广泛，既可以是亲属，也可以是朋友、专业人士，甚至是法人机构等。这样一来，个人的意愿决定权就可以通过意定监护制度让渡给家庭以外的成员，从而实现去家庭化。在不婚化叠加老龄化的日本社会里，护理保险制度与成年监护制度已经成为支撑单身老年人生活的两大支柱，有效缓解了家庭缺失带给个人与社会的冲击。

然而，去家庭化的措施不同于鼓励结婚的方式，它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通过降低家庭的作用来减缓不婚化对个体和社会的冲击，但是又能通过降低个体的结婚意愿进而加深社会的不婚化程度。去家庭化的政策、结婚意愿与不婚化现象的关系如图 3 所示。具体而言，在结婚是组建家庭前提的社会里，当不婚化现象出现时，政府采取去家庭化的政策来缓解家庭缺失带来的冲击，然而去家庭化的政策也会削弱家庭作用进而降低个人的结婚意愿，个人结婚意愿的下降又将加剧社会的不婚化现象，去家庭化的政策与不婚化现象通过结婚意愿相连，三者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终身不婚的人生道路，不婚化带来的冲击也越来越强，特别是家庭主义浓厚的福利体制②承受着巨大压力。日本政府出台并多次修改《护理保险法》、成年人监护制度等等，试图通过去家庭化的措施来解决不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虽然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婚化带来的冲击，但同时也加深了不婚化程度，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在 2000 年至 2020 年之间从 12. 57% 上升到 28. 25% ，女性也从 5. 82% 攀升至 17. 81% 。③ 在如今的婚育环境和婚姻制度下，个体结婚意愿下降必然会加剧不婚化现象，需要切断“去家庭化政策—结婚意愿—不婚化现象”的闭环链锁。但是当前，不管日本的政策如何推进，都会面临两难困境：如果继续强化去家庭化的政策，将加深不婚化程度；如果弱化去家庭化的政策，又会有大批的单身人士老无所依。

① 渡部朗子「成年後見制度の再検討」、『高岡法学』第 41 号、2022 年 12 月、122—132 頁。

② 落合恵美子『親密圏と公共圏の社会学—ケアの20 世紀体制を超えて—』、有斐閣、2023 年、182—187 頁。

③ 「表 6 - 23 性別 50 歳時の未婚割合、有配偶割合、死別割合および離別割合 1920—2020 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 版）』、2024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 ipss. go. 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 Detail2024. asp? fname = T06 - 23. htm[2024 - 11 - 0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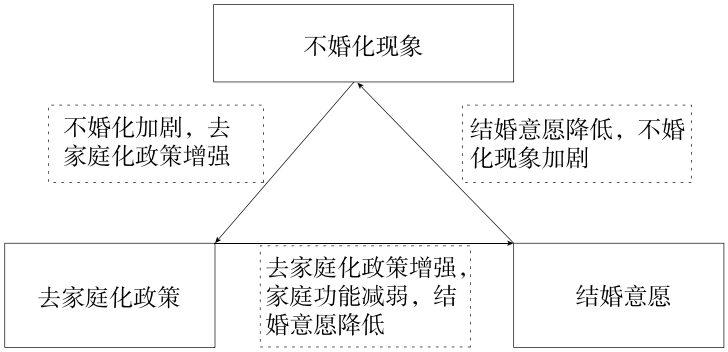


图 3　不婚化现象与去家庭化政策的关系

四、结　语

在战后近 80 年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的婚姻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从经济高速增长期构建的“全民皆婚”社会形态，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的不婚化萌芽期，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正式步入不婚化社会。不婚化社会的形成是结婚意愿持续走低与婚姻市场机制“失灵”双重压力下的必然结果。这一社会现象，虽为个体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生命体验，但也对以婚姻为基石的家庭结构以及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构成显著冲击。

随着不婚群体的日益扩大，以“全民皆婚”为基础和前提构建的日本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少子化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固化、养老负担加重、社会孤独感蔓延等问题接踵而至，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社会发展的顽疾。在日本社会，个体自由与独立已成为普遍价值取向，尽管不婚化带来诸多问题，但政府在婚姻问题上的干预能力极为有限。政府主要采取鼓励结婚与去家庭化政策和措施，试图缓解不婚化对社会的冲击，但这些措施存在“药不对症”和进退维谷的困境，在提升结婚率、遏制不婚化方面成效甚微。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预测，到 2040 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将攀升至 30.4%，女性的不婚率也将提升至 22.25%，[①] 日本不婚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中国的婚姻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数据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世帯数の将来推計（全国推計）（令和 6（2024 年推計）』、2024 年 4 月 12 日、16 頁、https：//www. ipss. go. jp/pp－ajsetai/j/HPRJ2024/hprj2024_gaiyo_20240412. pdf［2024－11－1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显示，婚姻模式正从传统的“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转型。[①] 但这一转型尚未完成，婚姻模式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例如，2024 年全国仅有 610.6 万对新人登记结婚，较 2023 年减少了 157.4 万对，降幅高达 20.5%；[②] 2020 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达到 29.38 岁，女性达到 27.95 岁，较 2010 年分别推迟了 3.63 岁和 3.95 岁。[③] 另外，近年的《青年婚恋意愿调查》发现有 34% 的青年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势。[④] 从结婚登记数与结婚率持续走低、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结婚意愿逐渐降低等趋势来看，中国有可能沿着日本曾经的发展轨迹，在“晚婚普婚”之后步入不婚化时代。在中国，婚姻是生育的前提，也是组建家庭的基础，不婚化社会的到来无疑会使中国面临与日本相似的问题和困境。

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不婚化现象初现至今已有 30 余年，其不婚化的演变历程、应对策略、面临的困境，都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样本。深入研究日本的经验教训，关注未来日本婚育政策的调整方向，以及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的重构路径，有助于中国在应对少子化、不婚化问题上探索适合东亚国家的有效解决方案。这也将成为中国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的核心议题。

（责任编辑：中　鹄）

①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在 2010 年前后出现了晚婚化现象，男性的初婚年龄从 2010 年的 25.75 岁上升至 2020 年的 29.38 岁，女性从 2010 年的 24 岁上升至 2020 年的 27.95 岁，但是终身未婚率（45—49 岁和 50—54 岁两个年龄段的平均值）依然很低，2020 年男性只有 3.92%，女性仅有 0.97%。由此可见，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转变。参见：《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s://www.stats.gov.cn/sj/pcsj/[2025-02-11]。

② 《2024 年 4 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https://www.mca.gov.cn/mzsj/tjsj/2024/2024dssjdtjsj.htm[2025-02-18]。

③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中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2025-02-18]。

④ 琚晓燕、姜振华、李燕平：《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青年婚恋意愿调查》，光明网，2021 年 10 月 8 日，https://news.gmw.cn/2021-10/08/content_35214247.htm[2025-02-1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Japan over discourse power in this field is expected to intensify. Potential strategic rivalry may also emer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e Strategic Division of Roles and Limitations of U. S. – Japan Efforts in Strengthening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s

Cao Pengpeng and Wang Zeying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s have become a key focus in the study of the U. S. alliance network. Amid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he U. S. has advanced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by placing the U. S. -Japan alliance at the center, and gradually constructing trilateral security frameworks such as the U. S. - Japan - KOR, U. S. - Japan - Australia, and U. S. - Japan - Philippines mechanisms. This effort seeks to weave a multilayered, multidimensional alliance network around China's periphery. Within this process, a strategic division of roles has emerged, characterized by U. S. "leadership" and Japanese "shaping". At its core, this division reflects a convergence of American global hegemonic ambitions and Japan's pursuit of expanded regional influence. As the initiator and principal driver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U. S.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setting strategic goals, embedding mechanisms, and assigning roles to allies. Japan, acting as a "deputy ally", complements this effort through bilateral policy coordination, military-security enablement, and strategic agenda alignment, thereby assuming a shaping and coordinating role. Under joint U. S. -Japan promotion,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particularly among the U. S. ,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U. S. , Japan, and Australia; and the U. S. ,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has grown increasingly robust.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se trilateral frameworks is not without constraint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erosion of U. S. strategic credibility and divergent strategic interests among member states pose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the "U. S. -Japan +"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s.

Japan's Increasing Trend Toward Non-Marriage

Cao Youshun and Hu Peng

Since the 1990s, Japan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changes in marriage patterns standing out a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he once-prevalent norm of "universal marriag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untry's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gradually given way to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ing non-marriage. The emergence of a non-marriage society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overlapping factors. On one hand, societal shifts have reduced the appeal of marriage and the social pressure to wed, while simultaneously making marriage more difficult to attain—leading to a decline i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marry. On the other hand, mismatched expect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partner selection, along with the weakening of stable matchmaking mechanisms, have led to a kind of "market failure" in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As both the desire not to marry and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a partner intensify, non-marriage in Japan has deepened,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oncerning social phenomenon. In a society where personal space and independence have become core values, especially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aces significant constraints in addressing the non-marriage trend. Direct intervention in private marital decisions is limited, leaving the government to rely on indirect measures such as encouraging marriage and promoting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family structures. However, these policies have often proven ineffective, failing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issue and leaving policymakers caught in a dilemma, unable to reverse the trend, yet increasingly aware of its long-term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